

一本刊和一部书的怀念

——寂寞学者蒋锡武

谷曙光

蒋锡武先生(下文称蒋公)去世已五年,他在世之时就低调沉寂,今日知其名者更少矣。他原本是京剧演员出身,唱花脸,后来居然转行搞研究、编刊物,专著有《京剧精神》等传世,主编的刊物《艺坛》留声学林,他是有“干货”留给这个世界的。

蒋公生前供职于武汉艺术研究所。2018年,其单位的江东等旧同事发起组织了纪念蒋公的座谈会,我因事不克赴会,后友人殷切地希望我写点文字,纪念蒋公。说实话,现今各行各业的名流巨擘,多如过江之鲫,而许多“占据要津”的红人,是根本用不着写的;蒋公则属于那种有真才实学,却寂寂寥寥的低调者,窃以为此种学人,是真需要“发掘”和书写的。我是晚辈,本轮不到我来写蒋公,何况《庄子·大宗师》有云:“鱼相忘乎江湖,人相忘乎道术。”然而,傅璇琮先生认为,在学林应反其道而行之,提倡学术上的“相濡以沫”,“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”。(傅先生有一本散文集叫《濡沫集》,即此意也。)故我今草此文,不过是追怀一位寂寞的京剧研究家罢了。

我和蒋公相识,乃是先师吴小如先生的介绍。大约二十年前,我还在读书时,买到蒋公主编的《艺坛》第一卷(以书代刊的正式出版物),真如空山闻箫,觉其书娇不群。吴先生也是《艺坛》的撰稿人,有大作在焉。我旋即给吴先生去信,赞誉其书,兼问其人。吴先生在回信中对蒋公极推崇,引为知音,并介绍蒋公与我通信往来。

很快,蒋公主动寄来十余册老年的《艺坛》杂志(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部刊物,不公开发行)。我这才了解,《艺坛》原来是由内刊转为正式出版物的。捧读之下,那十余册内刊《艺坛》,真令我“惊艳”,竟生出一种张生初遇莺莺的“目定魂摄,不能遽语”之感。说一句刻薄的话,中国的大多数内刊,不过是聋子的摆设——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;而蒋公主编的内刊《艺坛》,比起正式期刊,居然不遑多让!上面的名人大家之作,层出不穷,简直就是第一流的阵容、上上等的佳刊!在《艺坛》内刊时期,王元化就每期必读,总说:“别的杂志我不大看了,这本《艺坛》我要看

的。”时至今日,我甚至认为,这份内刊,如有机会,可影印或摘编再版,以广流传,庶不负蒋公当年办刊的苦心孤诣。

我曾撰文,谈民国时沪上的老辈剧评家张古愚,以一人之力,殚精竭虑地编《戏剧旬刊》《十日戏剧》等期刊,这种“痴人”,简直就是为京剧而生。而蒋公,也是在编刊物上,倾注了极大的心血,他临事以敬、处事以专,终于在本不能出成绩的地方,硬是干出了出人意表的成绩。说蒋公是当代编刊的行家里手,殆不为过。我以为,他当年如果有一个更好的平台,是可以编出中国最好的刊物的。

谈《艺坛》,附带着蒋公的交游也很值得一谈。要知道,办刊物,最难的,是有名家愿意源源不断地“赐稿”,而内刊想要得到名家稿源,更是难如上青天。蒋公的《艺坛》居然做到了,殊为不易。北京的几位老辈,如张中行、朱家溍、刘曾复、先师吴小如等,蒋公都很熟,可以登堂入室,把臂倾谈半日。更难得的是,他与当代鸿儒王元化、叶秀山过从甚密,《艺坛》后虽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,但仅出两卷即难以以为继,是爱才惜刊的王元化施以援手,将《艺坛》由武汉转到上海的出版社,第三至六卷才得以渐次面世,故王元化可算是《艺坛》的“续命人”。其实,后来在上海,《艺坛》也换了两家出版社,详细内情不知,但艰难是一定的。王元化愿意出死力助蒋公出《艺坛》,刊物之价值不言而喻。从第三卷开始,封面印出了“王元化顾问”的字样,他这个顾问,可不是挂名的,真是“既顾又问”。

蒋公撰有《王元化与京戏》一文,记述了他第一次拜访王元化的情形。1995年某日下午,蒋公如约登门,但王元化临时有事,不在家,王夫人张可就让蒋公等一等。傍晚时,王元化回来,热情留饭,谈兴甚浓。蒋公的文章记席间一情节,极传神:

谈话中,有原上海市委统战部的一位老同志来访,为潘汉年的事;又有人打电话托先生转交材料和章念之,因后两天先生与章要在南京路新华书店签名售书,张可老师问怎么办,先生有些不耐烦,说道:“你们哪,一个是潘汉年,一个是章念之,我现在

是要和锡武谈京戏!”王元化与蒋公初次见面,就一见如故,那种欲谈戏而不愿被打扰的急迫神情跃然纸上。他后来不但每期给《艺坛》供稿,还不遗余力地多方呵护。在《艺坛》第六卷编校中,王元化驾鹤西去,而此刊也就在出第六卷后戛然而止。这真是一段善缘。

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叶秀山,本业搞西方哲学,他一般是不跟戏曲圈内人玩儿的,而蒋公是个例外。叶秀山谈京剧的集子——《古中国的歌:叶秀山论京剧》(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),居然请蒋公来写序言,这足以让蒋公自豪,也说明蒋公在叶秀山心中的“分量”。而那篇名为“哲人的眼光”的序言,确是谈言微中,举重若轻。叶秀山也曾为蒋公的名作《京剧精神》撰写了书评,足见推崇。蒋公以一个半路出家的后辈,居然能与那么多耆老鸿儒谈笑往来,如真才实学,是不可想象的。我以为,蒋公绝不是靠吹捧结交来结交、打动这些前辈名家的,而是用他的一本刊《艺坛》和一部书《京剧精神》,外加吐属不凡、待人诚恳,来博得老辈的信重支持。

蒋公的《京剧精神》(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),是中国第一部京剧美学专著,也是一部传世之作。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半途转行的研究者,居然写出这样一部“学院派”色彩浓郁、理论思辨性极强的学术专著,令人钦佩不已。说心里话,新时期以来的戏曲研究论著、图书,数量非常多,但真正具有学术价值,能自树立,不因循、有生发的,并不多见,而《京剧精神》肯定算一部。蒋公以此大雅之作,可留名学林艺坛而无愧色矣。

在《京剧精神》中,蒋公议论英爽,笔锋锐利,如谈京剧的古典精神一节,独具慧眼地拈出“和”“玄”“游”三字细加论析。“游”的艺术一段,又以“心斋”“坐忘”的审美状态,“秉物以游心”的审美胸怀,“至人”“圣人”的审美鉴赏等三要,结合当年马叙伦听余叔岩歌,展开剖析,畅谈“游于京剧”艺术的要件,理论阐发游刃有余,文字表述甘美有味。蒋公的阅读面宽广,在书中,每每征引古今中外文艺理论的经典论

述,头头是道,读其书让人感到如入雅室,觉屋内琳琅满目,摆设精致。他的引书,擅长征引最精辟的几句话,不多不少,恰到好处,既说明了问题,又为自家著作增光添彩,这也是写作功力的体现。一个演员出身的研究者,在文字和理论方面,达到如许境地,需要花费多少工夫?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”,王临川的名句颇有助于我们理解蒋公治学的艰辛。纯理论的《京剧精神》,实在是蒋公的扛鼎之作!蒋公另有一部《京剧思辨录》出版,系他谈戏文章的汇编,其中也摘编了《京剧精神》中的若干篇。这部书印数较少,知者不多。

蒋公久居武汉,晚年则多前往上海女儿处,故我与蒋公见面机会不多。2007年春夏,我在人民大学主持了一学期的“京剧与中国文化”系列讲座,先后邀请了吴小如师、钮骠、孙毓敏、傅谨等开讲,一时学生选课者竟达300人,大大出乎校方和我本人的预期。当年5月,适逢蒋公来京开会,我趁机邀请他到人大讲座。记得那是一个傍晚,蒋公来校后,我先陪他在食堂用简餐,然后登坛开讲。蒋公口才很好,慢条斯理地脱稿讲了半天。那天讲的具体内容,我印象不深了。却记得,讲座后,蒋公跟我聊,他在武汉的高校,类似讲座已讲过多次,而今天人大的“座儿”效果,远不如武汉。盖讲前不该先吃饭,俗话说“饱吹饿唱”,吃得饱饱的,“精气神”就散漫了……蒋公对于未发挥到最佳状态,言下不无遗憾。我初听那一番“不该先吃饭”的理论总结,也曾暗自发笑,旋即感慨,蒋公不愧是京剧理论家,那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精神,足令人钦佩。

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”蒋公已矣!他不在高校,不带学生,故无弟子传其学;但其所著之《京剧精神》、所编之《艺坛》,是研究京剧的必读之书,足以传世。而上海东方卫视柴俊为导演主事之《绝版赏析》,也将蒋公留下了一些难得的谈话音像资料。惟愿世间再有类似蒋公的人才出现,则京剧幸甚,学林、艺林幸甚。谨以小文怀念一位寂寞的京剧研究家,历史会记住蒋锡武这个名字的。

张承志托请萧乾,自有道理。他俩都是《大公报》的报记者,于是札中才有“老同事”一说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萧乾将《萧乾短篇小说选》等著译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,于是与该社人员熟捻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王思宇收到萧乾转来的信函,于1月16日撰写书面报告,向上级汇报:《萧涛诗笺》不久出书,估计稿费不下一千元,希望同意张承志的预付要求。诗人屠岸作为领导,当即批示,签名同意。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复函张承志:

萧乾同志转来大函已收悉。大著早已印发,未能及时印出来,我们也很着急。经度度催询,据说原因是插页过多,工厂装订费时,所以迟迟未能见书,至为歉仄。

关于稿费事,因财务部门需根据出版物结算,因样书仍未见,故目前无法“全部付清”。至于预支七百元,我们认为是可以的……

除去书影七帧,《萧涛诗笺》另外附图仅有五张,包括张大千的《萧涛诗笺图》、关山月的《吟诗楼图》。“插页过多”导致此书迟迟不出,只能是“据说”的托辞。幸运的是,1月20日,张承志就顺利取走七百元,有人民文学出版社“预支稿酬支付单存根”为证。七百元时是一笔不小的款子,张承志的难关应该是不会过了。

打2008年开始,十余年来,我先后出版了《看草》和《杂花生树:寻访古代的草木圣贤》两本书,连获“中国最美的图书”美名。又后来集出版了

序跋精粹

《见花》《茶事一年间》,其中的草木气息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些年,能找到适合我的写作主题,并且源源不竭坚持下来,算我幸运。《蒿香遍地》以黄河两岸一年四季的野菜和蔬果为记录、考证和抒情对象,普及久远古老的博物知识传统,兼及乡愁。它不止怀旧,也是一份反映土地、社会和景观变迁的另类记录——我是1950年代人,希望能以燕口衔泥的精神,不弃细微,用心写作。

使我受到启发的作家,还有张承志先生。在谈及大变化波及内蒙古牧民和牧草的关系时,他说了这样一番话:“谁也没有料到,当这里被铁丝网划分为以户为单位的私营用地以后,亘古的牧草居然不够吃了。一页已经呼啦翻过,一切都迎来了质的改变。愈是目击古今,我就愈是惊讶不已——居然我们是最后一代见识了古代的牧人。”(《十张画》)我懂得他的话并心领神会——对于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变的田野、田园,我于我的家乡,及旧时的农耕方

式,等等,也是“最后见识了古代”之人。中国“杂草的故事”之一,明代的《救荒本草》,编撰者朱橚是朱元璋的儿子,被封藩在开封,称周王。他和自己团队的采集范围,包括南太行地区,那一带正是我的老家所在。他书里林林总总的野生植物和蔬果,生生不息依旧存在,而当代的年轻人对之已经很陌生了。就是与我的年龄差不多的朋友,也渴望重新温习。而从小就熟悉它们的,这些年又重新关注并亲近它们,带着感恩的心情记录写作,觉得自己在做与《救荒本草》的现代对接。因此,这是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。

张承志是一个亦文亦画之人。“画者,文之极也。”肯定与开放以来的精神面貌获得大解放有关,现在的作家和文人,爱作画、信手作画,并且画得一笔好画的人比过去显然多了。我自己出版的书,有的也附有我的画。而这一次,我对编辑说,我要为这本书,集中

再做一遍插画,让插画多些、醒目些。我是半路出家,情不自禁用写字的硬笔画花草的。面对所钟情对象,描画出同样一棵野菜野草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不同形状,是我对花木花草的致敬,它使我与草木、土地贴得无比亲近。白石老人作画表现出的“蔬笋气”“泥土气”和“草木香”,一直令我神往。

旧的本草著述,如《救荒本草》与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的插图,曾引起过域外的现代关注。但是,周王和吴状元,没有区别、明确作文和绘图之人,著作权边界是含糊的。当代日本人的《杂草记》,一人撰文,一人插画,明明白白是分开的。我要一身二任,既作文又作画。张月阳编辑师出名门,她不仅热情接纳这本书,而且容许我注明自己的插画版权,对我是莫大鼓励。我这样做,只是为了让读者喜欢我的书的创作,增加亲近和亲切感。

特别要感谢的人,还有成都中医药大学年轻的教授王家葵先生,——他是文人气十足而十分可爱的本草专家和书法家,这些年担纲注释《救荒本草》《植物名实图考》等本草经典,小品文字与专栏文章也机智过人。近年,我读他的书受益不少。这次应我的请求,葵兄仗义为本书题签,使我十分欣慰。

2019年11月9日于郑州甘薯居 (本文为黄山书社即将出版的《蒿香遍地》跋)

小孩放学回来告诉我,今天老师批评谁了,因为他昨天晚上作业是他奶奶帮他写的。我对小孩说,这个奶奶真是个好奶奶。如果他奶奶不帮他写作业,他就没有充足的睡眠,没有充足的睡眠,第二天,上课就要打盹,他就学不好习,到时候反而损失更大。

据报道,杭州有一个学生,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作业,家长一着急,打骂了小孩,第二天,心疼孩子的奶奶带着小孩准备“逃回”老家几天,引发一场虚惊。事后,网友评论很有意思,说“是亲奶奶”。

这两位奶奶具体的做法虽然不很妥当,但其爱护小孩、保护小孩的出发点却不能说不对。“张而不弛,文武不能也。”“藏焉修焉,息焉游焉。”此乃万事万物之通理。然而,张而不弛,作而不息的“变态”,成为今天学生的“常态”。问题是,对小孩来说,身心发育尚未健全,长时间、超负荷的学习必然会损害其身体和精神。福泽谕吉云,“常言道,活泼的精神高于健康的身体。生来虚弱多病,就不会有超人的智慧与判断能力。即使有智慧和判断能力,也难以应用。一个才智优秀而身体虚弱,就好像蒸汽足而锅炉的质量低劣,如果蒸汽量大,锅炉就会爆炸。”没有很好的身体,焉能很好地学习?

身体好才能学习好,不能因学习而损害身体。以前,很多家长都懂这个道理,而今天,我们的家长却往往不懂。

“观屏突兀蓬婆雪,书几青荧莲勺灯。稚子可怜贪夜课,语渠循旧未须增。”(陆游《新凉夜坐有作》)陆游看到孩子晚上功课做得很晚,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,他没有像我们今天的家长那样劝小孩好好干、继续干,相反,他劝孩子把日课学完即可,不必再增加更多的学习任务了。可见,陆游能够体恤到孩子熬夜苦读的幸福。

《红楼梦》中,贾母听宝玉说兰小子在“学堂”能对得上对子,还被老师“夸他明儿一定有大出息”,很是高兴。但她同时也提醒说:“就只他还大小呢,也别逼紧了。小孩子胆子小,一时逼急了,弄出点毛病来,书倒念不成,把你的工夫都白糟蹋了。”(《红楼梦》第八十八回)可见,在贾母眼中,学习固然重要,成绩固然重要,但身体,特别是尚未成熟的小孩子的身体,值得格外关注。

黄绍斌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,说他的父亲常说:“儿童读书,不可开始过早,尤不可督教严。过早过严,易伤身心,丧个性,长大必无所成。应等他年龄稍长,智识稍开,然后随其所喜,而善加诱导,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。”他的父亲主张一种宽松的教育,为他所聘请的塾师,皆“宽厚平和”,并劝塾师对小孩“不可轻施夏楚”,所选的课本都是“极浅近而易于记忆的”,至于

向贾母学习

陈占彪

不适合儿童心理的经书,并不强求诵读。黄绍斌的父亲关于儿童教育的这些意见,简直就是治疗今天“作业压榨病”的绝佳药石。

杨步伟的祖父也不主张以学习来压迫小孩。在杨步伟小时候上学的时候,“有时逃到曾祖母房内不出来,给曾祖母做点小事。先生来叫总说曾祖母要我做事耽误了,曾祖母就出来骂先生。先生不敢回曾祖母,就和祖父说。祖父也不说不要逼紧了小孩们,逼紧了他们就会怕念书的,那样也许书反而念不好,并且他们念完了随他们出来玩好了。”杨步伟的曾祖母“倚老卖老”,“骂先生”的场景令人发噱。相对于追着小孩、逼着小孩读书的老师来说,她的祖父的见解,显然更高明些。

学习重要,但学习是有限度的,这个限度就是身体。可是,今天,被语、数、英“三座大山”压迫的小孩感到忧愁、烦躁、无助乃至哭闹的时候,我们做家长的非但不能“急令飞雪化春水”,同情、理解、疏导乃至帮助他们,反而“风霜刀剑严相逼”,逼迫、斥责、惩罚甚至虐待他们。陈鹤琴曾说:“小孩子往往在父母教师双重压迫之下,断送了前途。这种摧残儿童的教学方式一天存在,小孩子要多吃一天苦头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做家长着应当向陆游、贾母、黄绍斌的父亲、杨步伟的祖父学习,向他们看齐。在目前的环境下,即便我们不能减轻小孩的学习负担,但至少不要站在小孩的对立面,“与孩子为敌”。

雪溪图(国画) 徐白一

有关《薛涛诗笺》的一件往事

彭伟

1985年夏,我因公上北京约稿。在京期间,他约我们于北京西城一家西餐馆同进晚餐,我与陈明同往。其时张老已过八十高龄,但仍面目清朗,身材挺拔,风度从容。他吸雪茄,吃西餐,是一个洋派老人。他平时即在这家西餐馆包餐。

张承志托请萧乾,自有道理。他俩都是《大公报》的报记者,于是札中才有“老同事”一说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萧乾将《萧乾短篇小说选》等著译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,于是与该社人员熟捻。

张承志托请萧乾,自有道理。他俩都是《大公报》的报记者,于是札中才有“老同事”一说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萧乾将《萧乾短篇小说选》等著译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,于是与该社人员熟捻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王思宇收到萧乾转来的信函,于1月16日撰写书面报告,向上级汇报:《萧涛诗笺》不久出书,估计稿费不下一千元,希望同意张承志的预付要求。诗人屠岸作为领导,当即批示,签名同意。当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复函张承志:

萧乾同志转来大函已收悉。大著早已印发,未能及时印出来,我们也很着急。经度度催询,据说原因是插页过多,工厂装订费时,所以迟迟未能见书,至为歉仄。

关于稿费事,因财务部门需根据出版物结算,因样书仍未见,故目前无法“全部付清”。至于预支七百元,我们认为是可以的……

除去书影七帧,《萧涛诗笺》另外附图仅有五张,包括张大千的《萧涛诗笺图》、关山月的《吟诗楼图》。“插页过多”导致此书迟迟不出,只能是“据说”的托辞。幸运的是,1月20日,张承志就顺利取走七百元,有人民文学出版社“预支稿酬支付单存根”为证。七百元时是一笔不小的款子,张承志的难关应该是不会过了。



雪溪图(国画) 徐白一

亲近草木

何频

《见花》《茶事一年间》,其中的草木气息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些年,能找到适合我的写作主题,并且源源不竭坚持下来,算我幸运。《蒿香遍地》以黄河两岸一年四季的野菜和蔬果为记录、考证和抒情对象,普及久远古老的博物知识传统,兼及乡愁。它不止怀旧,也是一份反映土地、社会和景观变迁的另类记录——我是1950年代人,希望能以燕口衔泥的精神,不弃细微,用心写作。

使我受到启发的作家,还有张承志先生。在谈及大变化波及内蒙古牧民和牧草的关系时,他说了这样一番话:“谁也没有料到,当这里被铁丝网划分为以户为单位的私营用地以后,亘古的牧草居然不够吃了。一页已经呼啦翻过,一切都迎来了质的改变。愈是目击古今,我就愈是惊讶不已——居然我们是最后一代见识了古代的牧人。”(《十张画》)我懂得他的话并心领神会——对于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变的田野、田园,我于我的家乡,及旧时的农耕方